

## 由貧窮至生活品質的衡量： 主客觀的建構方法

何華欽

### 壹、前言

國際上常用的貧窮測量指標常以所得作為衡量標準。如盧森堡所得研究（Luxembourg Income Study，簡稱 LIS）常以中位所得的 1/2 作為跨國貧窮比較的標準。台灣貧窮研究也常以所得作為唯一的衡量指標，如王德睦、呂朝賢、何華欽（2003）所建立的貧窮門檻，以家戶所得來評估貧窮與否。然而所得匱乏只能呈現單面向的貧窮（unidimensional poverty）狀態，無法呈現其他生活面向的樣貌。因此如何在研究中呈現貧窮的多元面向，多元貧窮（multidimensional poverty）成為新研究發展的趨勢。王德睦、何華欽、呂朝賢（2005）以貧窮發生率、強度與不均度三個指標，來呈現貧窮的多元樣貌，是國內多元貧窮測量的代表作。本文承繼多元貧窮的思考，目的在於加入生活品質元素的測量，增加貧窮測量的廣度，進而建構一個能考慮到貧窮匱乏、亦能關照到主客觀生活品質的建構方式。

### 貳、貧窮是生活標準的衡量

貧窮是生活標準的衡量，低於生活標準的狀態即為貧窮。生活標準是滿足人類生活需求的標準，此概念內涵與人們的居住環境、可消費的財貨與服務、以及人們可獲取的資源有關（Bradshaw, 1993）。生活標準通常以客觀的指標來測量，客觀的指標是關於經濟條件的測量，例如藉由個人可支配所得、社會參與程度、貧窮程度來測量。當達到滿足人類生活需求的標準，也意味著達到普遍的家庭標準（prevailing family standard），具有較好的生活品質（Bradshaw, Mitchell, & Morgan, 1987; Watts, 1980）。

然而一般的生活標準到底要滿足多少需求才足夠？「多少才足夠？」這個問題，從二十世紀以來常以各種形式出現，例如人們需得到多少足夠的錢或資源，才能免於剝奪、貧窮或社會排除？若將「多少才足夠？」這個問題，聚焦於個人主觀的福祉時，必須考量以下幾點：1. 足夠『做什

麼』？(enough to do what) 如何才可以達到特殊的生活水準或福利水平，而不至於匱乏。2.『誰』足夠？(enough for whom) 人們處在不同的環境下會影響他們對於福祉的感受。比如家庭規模大小對於福祉的感受皆不同。3.『根據誰』才足夠？(enough according to whom) 我們是根據專家的判斷，還是根據自己主觀的評斷。

決定多少才足夠？這個問題的決定一方面必須根據我們所處社會的文化預期，另一方面則根據決策者所制訂的法令、規則。決策者（擁有權力者）並不僅只限於政府與政客，擁有權力者還包括專家與媒體。歸納而言，目前有三種方法能作為足夠的判準：

#### 1.社會指標

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我們一般的文化定義，維持社會認可的最小標準是什麼？哪些必需品是社會上所不可或缺的？

(Gordon & Pantazis, 1997; Mack & Lansley, 1985)

#### 2.態度調查

運用可靠的問卷方法來研究發現一般人平均而言的最小所得，家戶需要多少最小所得才可以滿足需求？(make ends meet) 才可以避免在該社會被稱為貧窮 (Berghman, Cantillon, & Marx, 1993)

#### 3.預算標準

聚集社會科學、統計、營養、人文區位專家，運用資料找出目前的標準和行為模式，計算最小足夠生活的成本。此預算標準是研究貧窮輪廓不可或缺的基礎 (Bradshaw, 1993)。

社會可以接受的生活標準是什麼？應該比維生標準還更寬裕。Townsend (1979) 認為：『人們需要金錢和其他的資源，而不只是得到足夠的食物、足夠的居家、衣服、財貨來保護他們存活於環境中，人們應該實現他們在工作場所、在家裡、在社區裡、在地方、在成為國家公民所預期的行為。』換句話說，生活不只是維生而已，還需社會參與；人不只是滿足基本需求而已，還需要滿足社會需求。

關於生活標準，Watts (1980) 曾定義四種標準：

#### 1.社會充裕的標準 (social abundance standard)

社會充裕的標準代表人們的支出選擇可以負擔得起奢侈的消費。

#### 2.普遍的家庭標準 (prevailing family standard)

普遍的家庭標準代表著典型或一般家庭可以達到的生活水準，此種標準能給予充分的機會來參與當代社會，並享有基本的選擇自由。適度 (moderate) 意味著位於存活 (Survival) 和能被社會認同的必要條件 (Decency) 之上，然而低於一般人所認為的豪華奢侈 (Luxury)。此標準大部分相似於 FBU (Family Budget Unit) 所建構的 MBA 標準 (Watts, 1993)。

#### 3.較低的生活水準 (lower living level)

在較低生活水準下來維持一個家庭，需要節儉且小心處理生活預算。若低於此生活預算，則會逐漸難以維持一個可接受的生活標準。

#### 4.社會最低的標準 (social minimum)

standard)

此標準處於一個維生的臨界區，低於此臨界區則是社會所關注的匱乏或剝奪。

以 Townsend (1979) 的論點來檢視 Watts (1980) 所提出的四種生活標準，那麼社會可以接受的生活標準應是普遍的家庭標準 (prevailing family standard)，也近似於 FBU 所建構的適度足夠 (Modest but Adequate，簡稱 MBA) 標準。適度足夠 (MBA) 生活標準最先由美國勞工統計局在 1948 年採行，用來決定都市工人的生活標準。此適度足夠 (MBA) 生活標準被描述成能充分滿足健康需求、效率、兒童培育、社區活動的參與等普遍的標準 (Wynn, 1972)。此適度足夠 (MBA) 標準也類似 Watts Committee 所謂的普遍家庭標準，Watts Committee 認為：「個人能有完整的機會來參與當代社會生活，並具有基本的生活選擇。適度 (moderate) 意謂著處於存活 (Survival) 和能被社會認同的必要條件 (Decency) 之上，然而低於一般人所認為的豪華奢侈 (Luxury)」(Watts, 1993)。

上述論點認為貧窮是生活未達到基本維生標準，而生活在適度足夠 (MBA) 的標準之上才是政策目標。適度足夠 (MBA) 的生活標準，包含基本需求的滿足與社會參與，符合生活品質的內涵 (實現與重要性)，而基於此內涵的測量才是好的測量工具。

## 參、考慮生活品質概念的多元測量

適度足夠 (MBA) 的生活標準，不應侷限於所得貧窮的測量，應考量生活品質概念來建構多元的測量方法。「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 這個詞彙意謂著人類需求滿足的情況，也意謂著個人或群體對生活滿意的感受程度 (Schuessler & Fisher, 1985)。如何促進生活品質是政策施行的主要目標，因此衡量生活品質具有極大政策意涵。

什麼樣的生活是具有生活品質的生活？人們該過什麼樣的生活，才能增進生活品質？佛洛依德很有名的回答是，愛與工作 (Twenge & King, 2005)。很明顯地，愛與工作是人類生活最主要的面向 (domain)。也就是說，有能力關心他人與他人互動，是「愛」的實現；有能力去做有意義的工作、把工作做好，是「工作」的實現，具備這兩種實現能力的人，生活品質也能更好。

個人是否與他人有較好的互動關係，我們可以從主觀的福祉或幸福感來檢視；工作提供機會讓人們可以社會參與，並增強培養個人的自主性與能力 (Ryan & Deci, 2001)，因此工作的實現也會帶來較高的主觀福祉。研究發現，人際關係滿意度與工作滿意度在整體生活滿意度中有很強的關連 (Judge & Watanabe, 1994)，然而這兩種滿意程度有時並非全等，有些人在人際關係滿意度上非常滿意，然而也有人僅在工作滿意度上表現不錯，這種經驗數據的差異，呈現人類生活的複雜面向。

從上述觀點來看，生活品質也可視為一種函數型式：第一，認定人們需求滿足

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稱為「實現」(fulfillment)，例如需求滿足的實現、人際關係的實現、工作的實現；第二，某項需求對於個人或是群體的重要性，可以由主觀福祉來測定，若某項需求的滿足帶來更多主觀福祉的滿意程度，則我們稱為「重要性」(importance)，例如維生的需求的重要性、社會參與的需求重要性等(Costanza et al., 2007)。因此簡單的策略是評估這兩種人類需求程度，第一種為「實現的程度」，另外一種為「需求的重要性」。當我們使用「實現」以及「重要性」的測量分數去測量生活品質，藉著追蹤人類需求的滿足「實現的程度」與各項「需求的重要性」的各別分數，我們可以決定是否生活品質已經改善。在這一種複合指標之下，不同社會、社區，在不同的時間點下，可以測量生活品質高低，也可以相互比較生活品質多面向的差異程度。

生活品質是一種具有多重面向的概念，因此也是一種多重尺度的測量。此概念包含了主觀與客觀的因素。關於目前的生活品質研究，呈現兩種不同的方法論，一種是用量化的社會經濟指標來反應人類需求滿足的程度；另一種是由個人自我陳述幸福感、快樂、自我實現、個人喜好等，也稱為主觀的福祉(subjective well-being，簡稱SWB)(Costa & McCrae, 1980; Diener, 1994, 2000; Diener, Oishi, & Lucas, 2003; Emmons, 1986; Kahneman & Krueger, 2006)。

客觀的生活品質(objective well-being)測量(Gasper, 2005; Kahneman,

Diener, & Schwarz, 1999; McCrea, Shyy, & Stimson, 2006; Smith & Clay, 2010)，關注總體社會、經濟與健康指標，例如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標(UN'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簡稱HDI)，以及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等(Commission, 2001)。在醫療領域與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研究，也有許多個人層次測量工具的發展，例如年齡、疾病程度與個人現況等等。然而，不管是總體層次或個體層次的測量，這些測量都只能提供一個管窺(snapshot)，讓研究者看到某些窄化的個人與社會需求滿足程度，然而卻無法拓展至其他議題層面，例如主觀的認同與心理安全層面。

生活品質的意義非常複雜，包含經濟、政治、社會、心理、文化等各個層面。上述所謂的客觀測量，只是一個「代理」(proxies)測量方式，讓主觀的經驗可以被客觀指標「代理」測量，然而，主觀、客觀之間仍然有模糊的空間需要釐清。簡單來說，生活品質概念是針對個人，概念包含生活跟品質的議題，唯有人可以直接評斷他們自己的生活，個人生活的經驗是最直接測量生活品質的指標。

主觀的生活品質指標是屬於個人的層次，測量個人的滿意度，反應主觀的個人經驗。主觀的生活品質測量聚焦於生活經驗的自我陳述，這個生活經驗包含社會、經濟、健康指標，感知需求被滿足的程度。生活品質是福祉(well-being)的主觀感受程度，在過去的文獻裡(Costanza et al., 2007; Cummins, Eckersley, Pallant, Van Vugt, & Misajon, 2003; Twenge & King,

2005)，主觀的福祉（SWB）經常被用來測量生活品質。然而，福祉的主觀測量有其困難，因為人類對於福祉的判斷，往往對照自己周遭的同儕團體，而無法有一個絕對的對照標準。

如上所述，生活品質的測量可以分為主觀、客觀兩個層次，早期生活品質測量指標的發展，仰賴政府的統計資料、仰賴客觀的環境條件。然而，強調客觀觀點，往往捨棄了主觀觀點，而測量生活品質最適合的方法即是直接去詢問人們對生活的主觀感受。因此，客觀的社會指標，並不能呈現個人在生活環境下的主觀滿意度。換句話說，客觀社會指標的產出，並不必然能代表個人的態度。客觀生活指標大部分仰賴政府資料的蒐集，然而，主觀的指標涉及到個人滿意度的測量，因此這兩種指標，應該設法整合在一起。

## 肆、生活品質的主客觀指標

生活品質是客觀人類需求的實現，以及個人或群體主觀福祉的實現（Costanza et al., 2007）。人類的客觀需求如基本的維生需求、再生產需求、安全需求等，主觀生活品質則是在測量個人或群體對幸福感、生活滿意度、效用與福利的回應。

客觀的生活品質指標，特別對鄰里、城市、鄉村的測量非常有效，早期如Maslow 採用跨文化的客觀指標來測量生活品質，例如，食物、居住、基本生活需求等，這些需求都具有跨文化的特性（Wahba & Bridwell, 1976）。客觀的指標，

可以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標，這些客觀的測量方法，可以幫我們蒐集標準化的資料。以下有七個指標是常用的客觀的生活品質測量指標：1.國內生產毛額（GDP）、2.消費物價指數（CPI）、3.消費預算、4.家戶支出、5.貧窮（貧窮風險率；人類貧窮指標）、6.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標（HDI）、7.所得的不平等。利用客觀的總體社會經濟指標，有助於掌握研究地區的客觀輪廓。

主觀的生活品質測量，透過問卷跟訪談工具來蒐集受訪者的生活經驗，瞭解受訪者的滿意度、幸福感、福祉等。主觀的生活品質測量指標能夠被有效的測量，條件必須是人們能夠感受他們自己的幸福與福祉的重要性。以下有三種指標，是常用的主觀的生活品質測量指標：1.生活滿意度跟幸福感、2.剝奪 3.對未來的樂觀程度。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WHO）設定了一套測量工具，稱為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WHO-QOL）（Angermeyer, Kilian, & Matschinger, 2000; O'carroll, Smith, Couston, Cossar, & Hayes, 2000; Orley, Saxena, & Herrman, 1998; Saxena & Orley, 1997），此工具正是主觀測量的代表作。

生活品質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是個人感受到他們的生活位置，感受他們在文化與價值體系的生活位置，他們的目標期待標準跟關心。在此定義下，生活品質包含六種面向：身體面向、心理面向、福利面向、社會關係面向、環境面向、精神層面的面向，而且生活品質就是上述這些面向的總和。這個問卷（WHO-QOL）的概念包含身體健康、心理狀態、獨立狀

況、社會關係、個人信念、以及環境的現況 (Lee, 2008)。由此定義來看生活品質，是一種主觀的評估，它鑲嵌著文化、社會、以及環境的脈絡。

不管是主觀或客觀的測量方法，單獨使用都有其限制。然而，這兩種方法的結合能夠讓生活品質測量更具意義，所以我們建議，生活品質是一種人類需求滿足，或者個人與群體滿足的函數，而且融合了主觀、客觀測量生活品質的問卷，更能獲得完整生活品質有效的圖像，更可以跨區域比較。

## 伍、考量個人與總體層次的生活品質指標

生活品質具有多重面向的概念，此概念包含了主觀與客觀的因素，因此也是一種複合 (composite) 指標的測量。客觀的生活品質指標仰賴政府的統計資料，具有高的信度；然而主觀的指標即是直接詢問人們對生活的主觀感受，具有高的效度

(Lee, 2008; Pacione, 1982)。儘管這兩種方樣在測量上有差異，但這兩種測量方樣能夠直接反應社會整體生活品質的好壞，因此好的生活品質研究必須是主、客觀並存。

生活品質是主客觀人類需求的實現。關於需求的內涵，本文整理各界對需求的討論內容 (Arshadi, 2010; Costanza et al., 2007; Ryan & Deci, 2001)，其內涵包括維生需求、再生產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資訊需求、社會參與需求、休閒需求、信仰的需求、情感表達的需求、認同的需求、自由的需求等。依據這些需求層面，考量個人層次與總體層次的向度，列出表一的需求指標。此外，將生活標準與生活品質概念整合，詳如圖 1。

將這些需求的種類，進一步區分成個人層次與總體層次，將可以釐清主觀與客觀指標的層次，並關照到社會結構差異的客觀面向，也能關照到個人主觀心理層面的測量架構。

表 1 個人層次與總體層次的需求指標

需求	個人層次	總體層次
維生標準	預算標準、多少所得才足夠維生、熱量攝取、健康照顧	國家對所得貧窮的測量、國家對熱量的界定、總體健康照護資料庫
照顧與再生產	產假、幼兒照顧、家庭照顧時間	國家對產假與家庭照顧的法令適切性、總體家庭照顧、家庭工作資料庫
安全	生病時誰提供照顧、誰照顧老年人、環境安全	居家護理、誰提供照顧、老人照顧方式、居住安排、犯罪統計、環境資料
情感連帶	對他人的情感依附程度	總體依附程度、自殺率、犯罪率
資訊取得	資訊取得方式、電視、收音機、網路	新聞媒體的使用量
社會參與	志工、協會成員	總體志工、協會成員的參與程度
休閒活動	休閒時間、休閒活動、休閒花費	總體休閒時間、休閒活動、休閒花費
宗教信仰	信仰經驗、信仰組織的成員、參與信仰活動的時間	各種宗教書籍的出版量或銷售量、總體信仰的評價
創造力/情感表達	自由時間的運用、工作時的表現	菁英文化組織、事件與參與，總體自由時間的運用
在地認同	主要的社會階層、對在地的認同	總體對在地的認同程度
自由	在各種社會脈絡下的自由（家庭、工作、宗教等）	總體自由指標、政黨投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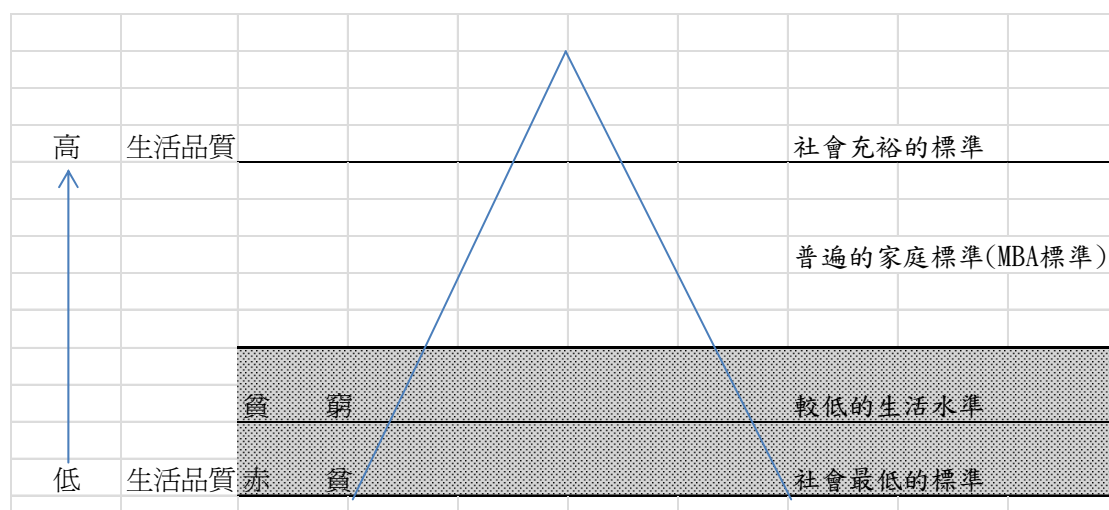


圖 1 生活標準與生活品質

## 陸、結論

本文承繼多元貧窮的思考，目的在於加入生活品質元素的測量，增加貧窮測量的廣度，進而建構一個能考慮到貧窮匱乏、亦能關照到主客觀生活品質的建構方式。生活品質概念是一種需求滿足的程度，意謂著人們對生活滿意的感受程度。生活品質具有多重面向的概念，此概念包含了主觀與客觀的因素，因此也是一種複合指標的測量。關於目前的生活品質研究，呈現兩種不同的方法論，一種是用量化的社會經濟指標來反應人類需求滿足的程度；另一種是由個人自我陳述滿意度、幸福感等，也稱為主觀的福祉。客觀的生

活品質指標仰賴政府的統計資料，然而主觀的指標即是直接詢問人們對生活的主觀感受。儘管這兩種方樣在測量上有差異，但這兩種測量方樣能夠直接反應社會整體生活品質的好壞，因此理想的方式是主、客觀並存的測量。本文嘗試建構一個能關照到社會結構的客觀面向，也能關照到個人主觀心理層面的測量架構，期許能朝向多元貧窮並關照到生活品質的測量方法，將有助於給予政策制定更多的資訊。

（本文作者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關鍵詞：**貧窮、生活標準、生活品質、多元貧窮

## 參考文獻

- 王德睦、何華欽、呂朝賢（2005）。貧窮的測量：發生率，強度與不均度：人口學刊。
- 王德睦、呂朝賢、何華欽（2003）。台灣貧窮門檻與測量的建立：FCSU 的應用。《臺大社會工作學刊》，(8)，1-46。
- Angermeyer, M. C., Kilian, R., & Matschinger, H. (2000). *WHOQOL-100, WHOQOL-BREF (WHO-QOL): Handbuch für die deutschsprachigen Version der WHO Instrumente zur Erfassung von Lebensqualität*. Hogrefe.
- Arshadi, N. (2010). Basic need satisfaction, work motiva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in an industrial company in Iran.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5, 1267-1272.
- Berghman, J., Cantillon, B., & Marx, I. (1993). *The future of social security in Europe*: Avebury.
- Bradshaw, J. (1993). *Budget standards for the United Kingdom*: Avebury.
- Bradshaw, J., Mitchell, D., & Morgan, J. (1987). Evaluating adequacy: the potential of budget standard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02), 165-181.
- Commission, U. N. S. (2001).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Report of the Friends of the Chair of the Statistical Commission: item.



- Costa, P. T., & McCrae, R. R. (1980). Influence of extraversion and neuroticism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happy and unhappy peo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4), 668.
- Costanza, R., Fisher, B., Ali, S., Beer, C., Bond, L., Boumans, R., ... Farley, J. (2007). Quality of life: An approach integrating opportunities, human need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logical economics*, 61(2), 267-276.
- Cummins, R. A., Eckersley, R., Pallant, J., Van Vugt, J., & Misajon, R. (2003). Developing a national index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Australian Unity Wellbeing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64(2), 159-190.
- Diener, E. (1994). Assess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Progress and opportunit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1(2), 103-157.
- Diener, E. (2000).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Vol. 55):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Diener, E., Oishi, S., & Lucas, R. E. (2003). Personality,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valuations of lif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4(1), 403-425.
- Emmons, R. A. (1986). Personal strivings: An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5), 1058.
- Gasper, D. (2005).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ell-being in relation to economic inputs: puzzles and responses.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63(2), 177-206.
- Gordon, D., & Pantazis, C. (1997). Measuring poverty: Breadline Britain in the 1990s. *Breadline Britain in the 1990s*, Ashgate, Aldershot, 5-47.
- Judge, T. A., & Watanabe, S. (1994).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and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67(2), 101-107.
- Kahneman, D., Diener, E., & Schwarz, N. (1999). *Well-being: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Kahneman, D., & Krueger, A. B. (2006).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 3-24.
- Lee, Y.-J. (2008).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measurement in Taipei.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43(7), 1205-1215.
- Mack, J., & Lansley, S. (1985). *Poor Britain*: Allen & Unwin London.
- McCrea, R., Shyy, T.-K., & Stimson, R. (2006). What is the strength of the link between ob-

- jective and subjective indicators of urban quality of life?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1(1), 79-96.
- O'carroll, R., Smith, K., Couston, M., Cossar, J., & Hayes, P. C. (2000). A comparison of the WHOQOL-100 and the WHOQOL-BREF in detecting change in quality of life follow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9(1), 121-124.
- Orley, J., Saxena, S., & Herrman, H. (1998). Quality of life and mental illness. Refle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QOL.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72(4), 291-293.
- Pacione, M. (1982). The use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measures of life quality in human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6(4), 495-514.
- Ryan, R. M., & Deci, E. L. (2001).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1), 141-166.
- Saxena, S., & Orley, J. (1997).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erspective. *European psychiatry*, 12, 263s-266s.
- Schuessler, K. F., & Fisher, G. A. (1985).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and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29-149.
- Smith, C., & Clay, P. (2010). Measuring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ell-being: analyses from five marine commercial fisheries. *Human Organization*, 69(2), 158-168.
- Townsend, P. (1979).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Twenge, J. M., & King, L. A. (2005). A good life is a personal life: Relationship fulfillment and work fulfillment in judgments of life qualit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9(3), 336-353.
- Wahba, M. A., & Bridwell, L. G. (1976). Maslow reconsidered: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need hierarchy theor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5(2), 212-240.
- Watts, H. W. (1980). Special panel suggests changes in BLS Family Budget Program. *Monthly Lab. Rev.*, 103, 3.
- Watts, H. W. (1993). A review of alternative budget-based expenditure norms. *Prepared for the Panel on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Family Assistance of the Committee on National Statistics*, revised (May).
- Wynn, M. (1972). *Family policy: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cost of rearing children and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Penguin.